

林云铭及其《楚辞灯》

邓元燮

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林云铭的生平际遇分析了《楚辞灯》的成书原因,并着重论述了《楚辞灯》的主要特点:通俗性和普及性;深入浅出,言近旨远;评析能顾及屈子全人,眼观作品全局。认为林云铭继承了他的前辈在楚辞研究方面的进步因素,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更新,在义理阐释、结构分析和词句解释方面不少地方独具慧眼,在楚辞的普及工作上亦用力最勤,对扩大楚辞的影响,深化楚辞研究,弘扬屈子忧国忧民精神,都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。

关键词 林云铭 楚辞灯 楚辞研究

林云铭,字道昭,号西仲,侯官(今福建省福州市)人。生于崇祯元年(1628年),卒年不详。其一生著述颇丰,主要有《楚辞灯》、《庄子因》、《挹奎楼文集》、《捐斋焚余》、《吴山穀音》、《韩文起》、《评选古文析义》等。

楚辞研究,延及于清,专著迭出,蔚为大观。清初林云铭《楚辞灯》,亦颇具特色,在楚辞研究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和影响。

《楚辞灯》能够写成,自非偶然。这与林云铭自幼养成的个性和一生仕途失意、际遇坎坷,以及反对叛乱、甘于淡泊的情怀都是息息相关的。

据王晔《今世说》记载,称林氏“少嗜学,每探索精思,竟日不食。暑月家僮具汤请浴,或和衣入盆,里人皆呼为书痴”。年二十举于乡,顺治十五年戊戌(1658年)进士及第,官徽州府通判。在徽九年,自云“余少痴妄,不达时宜,私谓用世可以得行其志,及筮仕后所见所闻,皆非素习,以故动罹谴诃”。康熙六年(1667年)以裁缺归故里。康熙十三年(1674年)靖南王耿精忠于福建起兵叛乱,因其拒不从耿,被囚达十八月之久。清兵破闽始得释。后寓居杭州,以卖文为活,与仇鳌、毛际可辈友善。此时常陷于困境,其《客杭书怀》诗云:“老去偏为客,病多不耐愁。疏钟千里梦,淡月半床秋。”贫病交加,终卒葬杭州。

其一生的挫折磨难,决定了他与屈原在思想上具有某些相通之处。象屈原那样,疾“众皆竞进以贪婪”,“恐皇舆之败绩”,亦“哀民生之多艰”(《离骚》)。如其《悯旱》诗云:“居民十万啼皆窳,骄阳不化土生烟。苦欲射鸟无羿附,柳幘村儿仰首呼。”对旱情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寄予深切同情。他如《老女行》、《白门治狱》、《猛虎祠》等,皆“郁勃之情如见”(邓之诚《清诗纪事初编》)。因此,他极易从屈赋中引起共鸣,也特别用心研读《楚辞》。在仕途失意之余,常读《楚辞》、《庄子》。自云:“每当读骚辄废书痛哭,失声仆地。因取蒙庄齐得丧忘是非之旨,以抑哀愤。”深感“注屈之难尤甚于注

庄”,《庄子因》先竣,《楚辞》评释“或作或辍”。耿精忠乱时,《楚辞》注释原稿又“没于闽变烽火中”。寓杭时,仍不改初衷,寄情楚辞,自云“徙寓武林以来……再注未就,又毁于回禄”。直至康熙三十五年丙子(1696年)，“杜门追忆,并补未注诸篇”(以上引文除注明出处者外,均见《楚辞灯·自序》),逾岁始成,即今所见《楚辞灯》。

从《楚辞灯》的成书过程,见其钦慕屈子、酷爱楚辞之心,及其对楚辞研究之矢志不移,甘苦备尝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曾无限感慨地吟唱道:“虽萎绝其亦何伤兮,哀众芳之芜秽!”“兰芷变而不芳兮,荃蕙化而为茅。何昔日之芳草兮,今直为此萧艾也?”在历史的转折关头,在国势飘摇、奸佞弄权之际,大浪淘沙,确有不少的人变节了。但屈原的精神和思想不朽,后继并不乏人。两千年后有如此倾心如林云铭者,屈子有知,亦当含笑九泉。

何以名“灯”?《楚辞灯·自序》云:

治骚者,向称七十二家评本,大约惑于旧说之传说,随声附和。而好奇之士,又往往凭臆穿凿,削趾适履。甚至有胸中感愤,借题舒泄,造出棘句钩章,武断卖弄。懵然不知本题之层折,行文之步骤,反谓庄骚两家,无首无尾,无端无绪,将千古奇忠日月争光奇文,谬加千层雾障,幻成迷阵。其所由来久矣。……二千年中读骚者悉困于旧说迷阵,如长夜坐暗室,茫无所睹。……颜之曰灯,庶屈子之文可以烛照无遗,即其志亦可以昭垂勿替。

林云铭对楚辞两千年研究史的追述,于前人研究成果,否定未免过头。其实,他承袭旧说处亦不少。其对屈赋诗意的阐释和篇章结构的分析,便融会了前人不少心得。又如其于九章编次和创作时间之考订,即本明黄文焕《楚辞听直》,亦并非创解。但也得看到,他称屈赋为“千古奇忠所为日月争光奇文”,意欲拨开“迷雾”,再现其光辉本色,因而着力针砭治骚中的某些弊病,用心还是好的。同时,此书从词句诠释、结构分析到内容总论,时有创见,启迪后学,亦非毫无价值之作。虽非“烛照无遗”,确也一定程度上起了“灯”的作用,不容一笔抹煞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云:“观所著诸书,实未能深造。是编取楚辞之文,逐句诠释,又每篇为总论,词旨浅近,盖乡塾课蒙之本。”《提要》语含讥刺,却正道出了此书主要特色之一,即具有通俗性和普及性的特点。

该书卷首有《自序》、《凡例》和《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》,并附《史记·屈原列传》,着重介绍其著述目的和体例,成书经过和甘苦,考订屈原所处时代和屈赋创作时间,意在指点迷津,开启门径,对阅读和研究楚辞无疑大有裨益。正文四卷,第一卷《离骚》,第二卷《九歌》、《天问》,第三卷《九章》,第四卷《远游》、《卜居》、《渔父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,全为屈赋,乃屈子专集。每篇皆旁加圈点,逐句诠释,分段疏解,篇末议论,条分缕析,眉目清楚。《楚辞灯·凡例》云:

是编文中眼目用重圈◎,上下呼应处用黑圈●,精妙处用密圈⊙⊙⊙,衬贴处用密点· · · · · ,其每段小歇处用横截一,大歇处用曲截⌒,总欲读者开卷便得。

从其圈点勾画,足见功力,利于后学者多也。还为难认和入韵的字注了音,处处为初学者着想,尽力做到使读者易读易懂。因此,颇受读者欢迎,曾盛行一时。该书最早的刻本是康熙三十六年丁丑(1697年)把奎楼刊本,其后覆刻、翻刻本不少。乾嘉年间,一些书坊还将不少楚辞注本易名为《楚辞灯》,如名刘梦鹏《屈子章句》为《楚辞灯章句》,称屈复《楚辞新注》为《楚辞灯新注》。民国六年(1917年)北京石印本《楚辞灯》竟题为《楚辞易读》。此书不仅在国内外流行,还远播海外,在日本即有宽政十年戊午(1788年)翻刻本、天保十三年(1842年)刊本传世。从其流传之广,影响之大,足见林云铭于楚辞之普及实有功焉。

《提要》斥之为“词旨浅近”，贬作“乡塾课蒙之本”，乃囿于馆臣之正统偏见。统观全书，着重于义理的阐释，致意于“知人论世”、“以意逆志”之说，力求深入浅出，言近旨远，乃其主要特点之二，非一般肤浅的“乡塾课蒙之本”可比。

《楚辞灯·自序》云：

夫屈子之文，屈子之志也。志不以世而夺。……屈子以王者之佐，生于乱国宗族，志无所伸，义无所逃，不得已以一身肩万世之纲常，寄之于文以自见。太史公既云推此志，又云悲其志，可谓善读屈子之文者。若知世风递降，而树立存乎其人。去流俗之见，以意逆志，则各篇中层折步骤，恍觉有天然位置，不啻为后人写意中事。是以尚友古人，贵论其世也。

《楚辞灯·凡例》云：

读楚辞要晓得屈子位置。以宗国而为世卿，义无可去。缘被放之后，不能行其志，念念都是忧国忧民。故太史公将楚见灭于秦，系在本传之末，以其身之死生关系于国之存亡也。

“知人论世”、“以意逆志”之说源于孟子。《孟子·万章》云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，是尚友也。”又云，“故说诗者，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；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”林云铭正是运用这一批评理论，联系屈原其人其世，颂其诗，读其书，并力求透过古人之辞探求古人之志，以明己见。

卷首所列《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》，起于楚怀王元年（前328年），终于顷襄王三十六年（前264年）。本着“知人论世”之说，将屈原事迹和屈赋作年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加以考察，列出了屈原生平简表，可资参证。其略谓：怀王十一年，楚为纵约长，与赵魏燕攻秦。时屈原为左徒，主立法富国，王甚任之。其招谗妒亦由此始。怀王十六年，楚绝齐攻秦，原左徒之位被夺。十七年，秦破楚于丹阳，原作《惜诵》。二十四年，秦昭王初立，厚赂楚，楚往迎妇，遂背齐而合秦。原越谏而被远迁汉北。二十五年，作《思美人》。二十六年，作《抽思》。二十八年，秦与韩魏共攻楚，原被召回，却未复其位。三十年，秦约楚于武关结盟，原力谏未果，怀王卒行，被扣于秦。顷襄王二年，屈原又被谗，放于江南，作《涉江》、《招魂》。三年，怀王卒于秦，作《大招》。四年，作《卜居》。七年，楚迎妇于秦，作《悲回风》。十年，作《哀郢》。十一年，作《渔父》、《怀沙》，遂投汨罗自沉。其对屈子身世和诗篇作年的考订虽非定论，有的作品是否屈作亦有争议，但这一研究方法可取，屈复《楚辞新注》即全文记载了《事迹考》。

林氏由“知人论世”而“以意逆志”，对屈赋主旨的探索亦具独见。为力求做到深入浅出、言近旨远，他不仅能顾及屈子全人，而且能眼观作品全局，并特别注重作品结构分析。此其主要特点之三。《楚辞灯·凡例》云：

读楚辞人之难，较之他文数倍。以其一篇之中三致意，所谓长言之不足而嗟叹之。上绍风雅，下开词赋，其体当如是也。总要理会全局血脉，再寻出眼目来。任他如何摇曳，如何宕转，出不得这个圈子。不用一毫牵强，自然杂而不乱，复而不厌。今人偶得一二句之佳，便鹤突击节，不顾上下文理难通，止谓哀惨之极。不觉重沓失次，茫如坐云雾中，支离凑合。此从来积习，愿与海内巨眼者共破之。

他反对断章取义，主张“理会全局血脉”，从作品全局着眼去推求作者意图，揭示屈赋主旨；反对“支离凑合”，力求“寻出眼目”，将结构分析同内容评说融为一体，通过结构分析切实地阐释诗句含义，议论得体而不空泛。

即如《离骚》，经他“寻出头绪，分出段落”，理清全诗结构线索，便顿觉一目了然。他把全诗分为十三段，这一划分至今仍被不少人沿用。从每段后的解说中，尤见其颇得诗人构思之妙。如“朝吾将济于白水兮”至“余焉能忍与此终古”一段后注云：“以上叙举世无知之后，才有往观四荒之

说，及上下求索，皆与世人混浊无异，竟无一知我类我者，则君必不能冀其一悟，俗必不能冀其一改，可知矣。此身所寄，少不得要决之于卜，定之于巫。虽滔滔汨汨，无数层折，弄成这一大段，看来却是下文灵氛、巫咸二段引子。”这就理清了前后文脉络，使整篇浑然一体。对《离骚》主旨的揭示，亦能顾及作品全局。开篇注云：“便有宗国不可去之义。”结尾又注：“已上把与国存亡之义，结出本旨。”诗中评说则紧扣中心，层层剖析，“若网在纲，有条而不紊”。因而其在篇末议论中称：“三闾大夫，是古今第一等人物，其文章亦古今第一等手笔。”其子林沅在《离骚》篇末“附识”中指出：

愚按屈子全副精神总在忧国忧民上。如所云恐皇舆之败绩，哀民生之多艰，其关切之意可见。因被谗疏绌之后，纯是党人用事，以致国事日非，民生日蹙，既哀自己，亦所以忧国忧民也。

“念念都是忧国忧民”，这一思想贯穿于所有屈赋，也贯穿于林云铭对所有屈赋的评说之中。

它如将《怀沙》分为五段，并逐段揭示其义理。“滔滔孟夏兮”至“冤屈而自抑”为一段，注云：“六句言伤怀永哀之实。”“刳方以为圜兮”至“羌不知余之所臧”为二段，注云：“已上追言己独守正，而世俗颠倒日甚，所以见放。”“任重载盛兮”至“孰知余之从容”为三段，注云：“已上言见放之后，复招诽谤，通国无一知其能，故不复见召。然自度本领，实非世俗所能知，又难专咎党人也。”“古固有不并兮”至“限之以大故”为四段，注云：“已上言前不见古人，后当以示来者，汨罗自沉，必不可已。”“乱曰”至结末为五段，注云：“已上总申前意，而自述其不怖死之衷。此投水绝命之辞也。”《怀沙》是否屈原“绝笔”，尚有争议。但林氏分析线索清晰，能较好地展示屈原复杂曲折的内心世界，对理解作品不无助益。

再如以《国殇》为“祭战死者之歌”，分为三段。开头至“严杀尽兮弃原野”为一段，“写国殇战死之勇”；“出不入兮往不反”以下四句为一段，“写国殇战死之武”；末四句为一段，“写国殇死后之灵”。篇末总论云：“三闾先叙其方战而勇，既死而武，死而后毅，极力描写，不但以慰死魂，亦以作士气，张国威也。”这些评析在现在看来也是基本可取的。

以上略论林云铭《楚辞灯》的主要特点及其在楚辞研究上的主要贡献。此外，他在词句的解释方面，可取之处亦不少。如游国恩主编的《离骚纂义》，就采用了《楚辞灯》数十条。其解词力求确切，释句力求简要，对旧注则择善纠谬。如“皇览揆余初度兮，肇锡余以嘉名”句下注云：“初生时气象便与凡人不同，父视而揣之，知余长成时必无邪行，始择其名之美者而命之。下文许多度字，俱本于此，旧注作时节，久妥。”又如“纷吾既有此内美兮，又重之以修能”句下注云：“言既禀有许多美质，又加以修治之力。下文许多修字，俱本于此。旧注作长才，大谬。”再如“既替余以蕙纕兮，又申之以揽茝”句下注云：“重叠以修葺得罪，不止一次。旧注君以蕙茝为赐而遣之，大谬。”所谓“欠妥”、“大谬”，皆一语中的。

从全书观之，由于其极力探索和揭示屈赋所包容的深层义理，有的分析确有牵强附会之疵（如对《九歌》某些篇章的阐释），亦难免有其局限（如特别强调屈原的“忠”）；因其深怕读者不懂，有的评说也难免评点派繁琐肤浅之弊。但总的说来，林氏继承了他的前辈在楚辞研究方面的进步因素，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更新，在义理阐释、结构分析和词句解释方面不少地方独具慧眼，在楚辞的普及工作上亦用力最勤，对扩大楚辞的影响，深化楚辞研究，弘扬屈子忧国忧民精神，都有着不可低估的贡献。